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21.04.013

# 绿色发展:本质意涵、现实困境与路径抉择

苟兴朝

(长江师范学院财经学院,重庆 408100)

**摘要:**首先探讨了绿色发展的本质意涵,然后分析了新时代中国绿色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新时代中国推进绿色发展的具体路径。主要结论是:第一,绿色发展本质上是从唯资本到生态与资本并重、再到生态优先的经济社会发展逻辑转换;第二,当前中国推进绿色发展面临着绿色发展支持政策的理论基础不明确、工业化进程的非同步性、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偏低、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多元化与异质性等困境;第三,当前中国推进绿色发展应当从积极培育和激发经济行为人的社会理性、力争向全球产业链上游发展,高起点谋划中西部地区产业布局、健全配套制度,充分发挥农业生产组织的绿色发展激励与约束作用、改造传统小农户,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范下乡资本的经营行为等方面着手。

**关键词:**绿色发展;本质意涵;现实困境;路径抉择;经济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D61;F12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21)04-0075-06

## The Essential Meaning, Realistic Dilemma and Path Choice of Green Development

GOU Xingchao

(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Yangtze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81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discusses the essential meaning of green development, then analyzes the main dilemmas facing China's green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and then explores specific paths of promoting green development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Firstly, the essential meaning of Green development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is a logical transformation from capital only to an equal emphasis both on ecology and capital, and then to ecological priority i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ext, at present, China's green development is confronted with many difficulties, such as vagu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supporting policies of green development, asynchronous progress with industrial growth, under-organize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diversified and heterogeneou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ntities, etc; Thirdly, the current green development in China should be pushed forward through the cultivation and stimulation of the social rationality of the economic agents, orientation to upper reaches of the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complying with the general industrial layout of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sound supporting policies, a full play of the stimulating and restraining functions of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organizations, renov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family-base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tyle, cultivation of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and standardization the employment of rural-oriented capital, etc.

**Keywords:** green development; essential meaning; realistic dilemma; path choice

### 一、引言

改革开放 40 余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2018 年 GDP 总量超过 90 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位,占全球份额的 16.7%;从传

统农业大国一跃而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向世人充分展示了中国“速度”。然而,毋庸讳言,在众多的世界“第一”和中国“速度”背后,付出的代价却是沉重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以资源和环境为代

收稿日期:2021-06-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后脱贫时代西南民族地区普惠治理下的防贫创新机制研究(19BTJ040);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理论分析、测度评价与提升路径(2021NDZD07);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长江上游地区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培育的路径设计与政策支持研究(21SKGH231)。

作者简介:苟兴朝(1973—),男,四川宣汉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绿色发展。

价的传统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中国亟须改弦易辙寻求全新的发展道路。在此背景下,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贯彻实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其中,“绿色发展”是对传统现代化发展路径的摒弃,是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实现双赢的良方,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引领<sup>[1]</sup>。

“绿色发展”被正式提出以后,迅速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与焦点。绿色发展这一概念可追溯至可持续发展的提出<sup>[2]</sup>,是以效率、和谐、持续为目标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发展方式<sup>[3]</sup>,它强调资源节约与环境建设、发展新型绿色产业、经济系统绿色改造等层面的含义。绿色发展是解决我国生态实践困境的必然要求,又是落实经济发展新理念的现实需要<sup>[4]</sup>。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是绿色发展的内涵,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是绿色发展的本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是绿色发展的目的<sup>[5]</sup>。绿色发展理念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根植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科学地回答了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事业的基本遵循<sup>[6]</sup>,内含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绿色技术创新、绿色经济社会发展制度创建以及倡导低碳生活方式等重要内容<sup>[7]</sup>,具有重要的伦理属性和伦理价值<sup>[8]</sup>;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绿色发展主要论述是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指导思想<sup>[9]</sup>,有其坚实的哲学基础<sup>[10]</sup>。农业绿色发展具体体现在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和农业面源污染少两个方面<sup>[11]</sup>;要实现农业绿色转型发展,首先要确保水土资源和环境质量<sup>[12]</sup>。2003—2018年我国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整体水平偏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好转趋势<sup>[13]</sup>。2005—2015年期间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稳步提升,呈现出“东中西”阶梯状递减的区域差异规律,且空间集聚特征明显<sup>[14]</sup>。苟兴朝,张斌儒等(2020)对2008—2017年黄河流域乡村绿色发展水平及其区域差异进行了评估与分析<sup>[15]</sup>。

综上所述,当前学界关于绿色发展的成果颇多,主要集中在绿色发展内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农业绿色发展、城市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效率以及绿色发展水平测度等方面,研究视角以经济学、政治学、哲学或者伦理学为主。然而,我们认为,经济发展模式选择不仅是一个经济或生态环境问题,而且还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作为绿色发展微观基础的绿色生产行为同时受到经济因素与非

经济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因此,本文将首先探讨绿色发展的本质意涵,然后分析中国当前实施绿色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在此基础上探索推进绿色发展的有效路径。

## 二、绿色发展本质意涵:从资本逻辑到生态逻辑的转换

1949年至1978年的30年,本应是新中国奋力追赶力争摆脱经济贫困的黄金时期,但由于新生的共和国政权面临着并不太平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极度缺乏经济社会建设经验以及长时间被扭曲的政治生活,经济社会发展速度极其缓慢。1978年的GDP为1495亿美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仅为1.8%,人均GDP为381元人民币,仅为同期印度人均GDP的三分之二,是当时世界上典型的低收入国家<sup>[16]</sup>。在此背景下,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大幕,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路。自此往后,加快发展速度、做大经济总量、增加经济收入成了经济活动的主要目标,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在经济活动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资本逻辑的强力主导下,中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腾飞:2017年GDP达到12.25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占世界经济比重高达15%,人均GDP达到8813美元,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国GDP增长持续时间最长、增长率最高的世界纪录<sup>[17]</sup>。回溯来路,对比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经济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之巨变,我们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解构了计划经济体制、重构了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在较短时间内迅速改变了新中国积贫积弱的落后状态,因此,它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正确性。

然而,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资本逻辑追求价值“增殖”,强制推动社会物质生产与生活,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渐对立。在资本逻辑主导与支配下,“自然地位从高高在上的神灵变成匍匐在人的脚下被支配的奴隶,人真正成为万物的尺度”<sup>[18]</sup>。资本逻辑在时间和空间上造成了恶劣的生产环境,无限榨取自然资源和破坏生态,造就人与自然的全面对立<sup>[19]</sup>,因此,资本逻辑在一定程度上是反生态的,资本疯狂逐利是生态问题的主要原因。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日益凸显的生态环境问题折射出了资本逻辑的反生态性。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经济快速发展造成了严峻的资源与环境不可持续问题,以“人成为万物尺度”为内核的“人类中心主义”遭到了空前诘难与拷问。在此背

景下,以人民利益至上为执政理念的中国共产党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及时地提出了“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深刻的发展理念意涵在于经济环境并重、人与自然和谐,既要做大做强经济总量加快经济“发展”,又要处理好人与自然和环境的关系,实现经济“绿色”发展;经济“发展”是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绿色”是发展的亮丽底色。从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只要金山银山”到“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和“绿色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嬗变,本质意涵上是从唯资本到生态与资本并重、再到生态优先的经济社会发展逻辑转换。

### 三、新时代中国绿色发展的现实困境

绿色发展既是宏观和中观层面上发展理念与发展路径的嬗变与创新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逻辑的转换,同时又是微观层面上生产主体生产行为模式的变革。在市场经济场域下,除了受市场因素的影响外,市场行为主体的生产行为模式选择还将受到社会制度、国家政策、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在当前传统发展理念根深蒂固、国际经济旧秩序尚未彻底打破、工业化进程非同步性以及绿色发展政策导向存在偏差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绿色发展还面临着诸多困境亟须破解。

#### (一) 绿色发展政策的理论基础: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

2016年12月财政部和农业部发布《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改革方案》,正式提出到2020年建成以绿色生态为导向,促进农业资源合理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农业补贴政策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的目标;2019年4月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联合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快建立省级土壤污染防治基金,保障耕地污染治理修复的资金投入<sup>[20]</sup>;2018年国家发改委颁布了《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提出了“完善污水处理收费政策”“健全固体废物处理收费机制”以及“建立有利于节约用水的价格机制”等要求<sup>①</sup>;2010—2015年国务院连续六年将《生态补偿条例》列入当年年度的立法工作计划,贵州、湖北、湖南、江西、江苏等省市也相继出台生态补偿地方性法规。不难看出,现有绿色发展相关政策制度的思路是通过提高经济成本、减少经济利润或者直接奖补等经济手段干预与规范生产行为,引导或者倒逼生

产者实施绿色生产。这种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在于经济行为的经济理性,即在政策制定者看来,生产者以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为行为目标。然而,经济行为是一种复杂微妙的社会行为,“多重动机(包括经济动机和非经济动机)同时在影响人们的行为”<sup>[21]</sup>。生产者在做出行为选择时,纳入理性思考范围的因素除了经济变量之外,还包括其他社会性变量,因此,他们不仅具有经济理性,而且还具有社会理性。具体就作为绿色发展微观基础的生产者而言,其所追求的目标不仅仅是经济效益,还包括像社会信任、良好声誉以及较高道德评价等对自身“有价值”的东西,因此其行为是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统一。毋庸置疑,基于生产者经济理性考量意图,用经济手段激励或约束生产者行为的绿色发展政策措施,将会产生一定的绿色发展促进效应,但忽视了经济行为社会理性的培育与激发,从而未能充分发挥社会理性的激励与约束功能,而且还因其不断强调和强化行为人的经济理性,使行为人更加唯“利”是图;绿色发展的经济激励政策或许在短期内能发挥作用,但从长期来看随着激励政策力度减弱或者被取缔,生产者行为最终有可能重新回到非绿色化模式。

#### (二) 工业化进程的非同步性: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的两难选择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与前提,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然而,工业化是一把双刃剑,在实现物质财富不断丰富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纵观世界工业化史,绝大多数国家都走了以消解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传统工业化道路,而且不同国家间工业化进程互不相同。一般认为,西方工业化始于第一次工业革命,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展开时间比西方要晚得多。比如,新中国的工业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开始的,迄今也不过70年时间而已。工业化进程不同,面临的生态环境约束也不同。“对于当前正处于工业化阶段的中国等后发式国家来说,既无条件也不允许占有类似当年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所享有的世界范围的资源与环境容量”<sup>[22]</sup>。不仅如此,在当前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下,“后发式”国家大都处于欧美发达国家主导下的全球产业链分工的低端,发达工业化国家不仅在经济上对“后发式”国家“薅羊毛”,而且凭借其资本与技术优势,将其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重、科技含量低的产业不断向“后发式”国家转移,致使“后发式”国家面临着巨大的生态环境压力与风险。1992年世界已经

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而且中国也未曾跳出“先污染后治理”和“边污染边治理”的传统工业化道路的窠臼。“中国大力发展两头在外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不排斥污染企业和工业垃圾的输入,使中国遭受严重污染”<sup>[23]</sup>。

作为世界工业化进程的一部分,中国工业化区域间非平衡性特征也较为明显。整体上看,中国当前已经出现了后工业化时代的基本特征,并带动世界进入后工业化时代<sup>[24]</sup>;但从区域来看,由于工业基础、地理区位以及自然资源禀赋殊异,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处于不同的工业化阶段,东部地区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而中西部地区仍处于工业化中期或后期阶段。区域间工业化进程非同步性的结果:一方面,伴随着产业由东至西的梯度转移,以废水、废气和烟尘为主要排放物的污染产业也随之转移至中西部地区<sup>[25]</sup>,致使中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另一方面,工业化进程滞后的中西部地区需要通过加快推进工业化以完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而这些地区又是全国的重要生态屏障区与生态脆弱区,在全国贯彻实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两难选择。

### (三) 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偏低:绿色生产行为的激励约束力不够

社会资本是一种具有组织特征的东西,如信任、规范与网络等<sup>[26]</sup>。诸如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公司+农户”之类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能为其成员提供生产经营行为规范、社会关系网络以及普遍信任等社会资本。在组织化生产经营模式下,农户通过嵌入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可获得比在分散化经营模式下更多的社会资本,更多的社会资本有利于激励或引导农户的绿色生产行为。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有关绿色生产经营的规章制度可充分发挥规范农户生产经营行为、引导农户实施绿色生产的积极作用。在行为规范指导下,农户生产的优质绿色农产品能赢得良好的市场评价和成就品牌,良好的市场评价与品牌对于农户和生产组织而言无疑都是一笔宝贵的社会资本。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内部密集的社会关系网络既有利于农户互帮互学绿色生产经营技术,又能有效监督农户生产经营行为。如果农户生产经营行为有违绿色生产的标准与要求,组织内部密集的社会关系网络即可充分发挥“纠察”功能。出于忌惮失去经济组织优渥的社会资本从而在经济与声誉上受损,农户将自觉地修正自己的生产经营行为。在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内,农户与组织之间、农户与农户之间因“重

复博弈”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产生了良好的普遍信任,从而避免了因“一次博弈”引致的机会主义行为。一旦农户发生例如滥施化肥农药等违约行为,组织内的信任关系遭到破坏,不仅农户自身遭受经济损失,而且声誉机制也将对农户的失范行为进行纠偏。

尽管近年来中国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但从整体上看,大多数农业生产经营仍然属于小规模分散化经营,特别是在自然条件较差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这一现象更甚。据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我国小农户数量占到农业经营主体 98% 以上,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 70%;到 2017 年 7 月底,全国在工商部门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193 万家,入社农户数超过 1 亿户,但仅占全国农户总数的 47%<sup>②</sup>,而且“能够正常经营运作的只有 10% 左右,大多数处于‘僵尸’状态”<sup>[27]</sup>。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偏低,分散经营的农户的绿色生产经营的激励约束力严重不足,市场上“一次博弈”导致的机会主义行为泛滥,从而导致农业生产领域化肥农药超标使用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禁而不绝。

### (四) 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多元化与异质性:绿色生产经营意愿与能力强弱不一

在国家系列“三农”政策的培育与牵引下,在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加速推进、农村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调整的影响下,近年来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不断分化与重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呈现出多元化与异质性特征,全职农户、兼业小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农业龙头企业+农户等都涉足农业。近年来,全职农户逐渐分化为规模经营户和小农户,规模经营户又包括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受生计多寡、年龄大小、风险好恶、受教育年限、农业收入占比以及相关制度设计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绿色生产经营意愿与能力强弱不一。全职小农户的谋生渠道少,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几乎是其养家糊口的唯一来源,农村是其生于斯长于斯的重要的生存依托与精神家园,但由于年龄普遍偏大、厌恶风险、受教育年限较少,对生态环境重要性的认知不够,这一群体绿色生产意愿和能力整体上偏弱。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孕育于农业与农村,从业人员平均年龄较全职小农户小、受教育水平较高、绿色技术接纳能力较强,但在利润最大化价值取向的影响与冲击下,其“绿色基因”逐渐消解、绿色发展意愿不断弱化,生产经营行为也逐渐转向粗放化与非绿化。兼职小农户经济收入来源多样化,非农

收入比重不断提高甚至超过农业收入,他们仅把农业收入和农村视为自己在城市非农经营失败后的生活来源与归根之处,较高的绿色生产技术采纳成本和较强的风险规避特征使得这一群体的绿色生产经营意愿也明显不足。从理论上讲,“作为经济互助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将广大农户联系起来,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推广使用有机肥料,严格执行生产标准,减少化学农业等有害物质使用”<sup>[28]</sup>,从而有利于改善农业生产经营环境、促进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但近年来,农民专业合作社异化、空壳化现象使其在促进绿色发展中黯然失色。农业龙头企业+农户模式本质上是社会资本下乡,由于资本逐利本性以及对下乡资本监管制度设计存在缺陷,在为农村引入资金和注入活力的同时,资本下乡也给乡村环境带来了难以承受之重<sup>[29]</sup>。前些年湖南与广东等农村地区频现铅、镉等重金属污染问题,就是资本下乡破坏农村生态环境的例证。

#### 四、新时代中国推进绿色发展的路径抉择

在当前“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蔓延、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依然复杂、世界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增加、六保六稳任务十分艰巨的背景下,由于突破传统发展路径的惯性锁定、转变传统观念意识、完善顶层制度设计、深化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等并非一蹴而就,实施绿色发展绝不能急于求成,而应保持历史耐心,做到持续用力、久久为功,扎实稳妥推进。

(一) 坚持经济与非经济激励相结合,积极培育和激发经济行为人的社会理性

经济生活的参与者本质上是一个社会行动者,其特殊性在于他是处于经济框架内的行动者,因此,通常说来,经济行为人天然地具有一定的社会理性。然而,这种天然的社会理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可能被经济理性所遮蔽甚至被取代,因此,需要借助外界力量培育和激发,使其发挥对行为人的引导与规范功能。在推进绿色发展过程中,在行为规范与引导方面,经济利益激励与约束等措施不可或缺,但声誉机制和道德规范等软约束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觑。而且,从长远来看,经济利益激励与约束是治标的、不可持续的权宜之计,通过声誉机制和道德规范培育、激发和“唤醒”经济行为人的社会理性从而引导其自觉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才是治本之策。因此,在今后推进绿色发展过程中,应坚持非经济激励与经济激励并重的原则,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和生态伦理教育力度,建立健全环境伦理约束机制,规划和约束经济行为人对自然的伦理

态度。

#### (二) 力争向全球产业链上游发展,高起点谋划中西部地区产业布局

全球产业分工格局既是一种现存状态,更是一个持续调整过程。总的来看,未来15~20年间,新技术的创新发展和扩散应用都处在加速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发展应用将成为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的“博弈改变者”<sup>[30]</sup>。为此,中国务必以更开放的姿态主动参与全球产业链重塑,促进制造业向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升级改造,加快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打破西方技术垄断,力争向全球产业链上游发展,拒绝成为“世界垃圾场”;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协调推进工业化与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双赢,在世界舞台上充分展现绿色发展的大国担当。针对国内区域间工业化进程非平衡性问题,从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是全国重要生态屏障和生态敏感区的重要国情区情出发,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在生态保护上以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高起点谋划产业布局,推动发展现代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智能+”产业,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由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两难”向两者协调发展的“双赢”转变。

#### (三) 健全配套制度,充分发挥农业生产组织的绿色发展激励与约束作用

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激励与约束作用不可低估,但由于当前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偏低、农民合作社异化和空壳化现象较为严重,其绿色发展的激励与约束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必须进一步优化完善土地流转、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业科研与推广等相关制度,大力培育多样化的农业生产组织,密切组织内不同主体间的利益联结机制,不断提升农业生产组织化水平,促进农业生产组织又好又快发展。坚持依法“治社”原则,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生产经营行为纳入法律框架内予以规范与约束,将财政补贴和优惠政策支持与合作社绿色发展绩效紧密结合起来;落实新修订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坚决处理异化合作社、清退空壳合作社,确保合作社在绿色发展方面的引领与示范作用。建立绿色金融制度,发挥公共财政对农业生产组织绿色生产的导向作用。

#### (四) 改造传统小农户,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范下乡资本的经营行为

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生态环保意愿与能力对

我国绿色发展而言至关重要。当前,伴随着农村社会结构不断分化与重组,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呈现出多元化与异质性特征,其生态环境保护意愿与能力也各异。为此,通过“公司+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等模式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逐步改造传统小农户的生产手段与方法,使其牢固树立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并不断提升自身绿色生产能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绿色生产的主力军,因此,须加快环境教育立法,加强宣传,着力

唤醒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业专业合作社的“绿色记忆”、培育其“绿色意识”与“绿色自觉”,引导其在追逐经济利润时自觉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做绿水青山的忠实守护者。健全和创新工商资本下乡监管制度,引导工商资本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绿色发展之路,在利用和驾驭工商资本过程中实现资本逻辑与生态逻辑的有机统一。

#### 注释:

- ① 郑新业:《促进绿色发展政策措施的重大创新》,《经济日报》2018年7月7日。
- ② 《农业部副部长叶贞琴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论坛上的讲话》,中国农民合作社网,2017年9月22日。

#### 参考文献:

- [1] 周光旭,郑璐.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的重大时代价值[J].自然辩证法研究,2020(3):116-121.
- [2] 霍艳丽.生态经济建设:我国实现绿色发展的路径选择[J].企业经济,2011(10):63-66.
- [3] 韩飞.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理念及其社会协作机制探讨[J].发展改革理论与实践,2017(4):28-31.
- [4] 黑晓卉,宋振航.我国绿色发展面临的困境及推进路径[J].经济纵横,2016(10):15-18.
- [5] 张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绿色发展观研究[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8(1):10-16.
- [6] 周军,刘冲.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绿色发展理念的基本逻辑及实践价值[J].理论探讨,2019(5):155-159.
- [7] 毛华滨,刘苏燕.绿色发展理念的四重维度[J].理论视野,2020(1):51-55.
- [8] 龙静云,吴涛.论以自然为根的绿色发展伦理[J].伦理学研究,2020(3):118-114.
- [9] 侯爱平,安梦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绿色发展思想的科学内涵与理论创新[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84-93.
- [10] 姜延博.论习近平绿色发展理念的哲学基础[J].湖南社会科学,2020(3):6-12.
- [11] 涂正革,甘天琦.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动力研究[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165-178.
- [12] 于法稳.习近平绿色发展新思想与农业的绿色转型发展[J].中国农村观察,2016(5):2-9.
- [13] 王喜平,李艳梅.可持续发展视角下工业绿色发展测度及其差异演化[J].工业技术经济,2020(7):83-91.
- [14] 周亮,车磊.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J].地理学报,2019(10):27-44.
- [15] 苟兴朝,张斌儒.黄河流域乡村绿色发展:水平评估、区域差异及空间相关性[J].宁夏社会科学,2020(4):72-81.
- [16] 张建平,沈博.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及其对世界的影响[J].当代世界,2018(5):13-17.
- [17] 程承坪,邱依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理论与实践[J].中国软科学,2018(2):160-167.
- [18] 任平.生态的资本逻辑与资本的生态逻辑[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5):161-165.
- [19] 张旋.论资本逻辑和生态逻辑之关系[J].现代经济探讨,2016(9):45-49.
- [20] 李学敏,巩前文.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绿色发展支持政策演变及优化进路[J].世界农业,2020(4):40-51.
- [21] 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J]. America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91):481-510.
- [22] 丁少锋.工业化进程中生态风险生成的逻辑及应对[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0(1):72-77.
- [23] 任继周,方锡良.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过程与农业伦理学响应——兼论后工业化的历史机遇[J].中国农史,2019(3):3-10.
- [24] 胡鞍钢.中国进入后工业化时代[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1-16.
- [25] 成艾华,赵凡.基于偏离份额分析的中国区域间产业转移与污染转移的定量测度[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5):49-57.
- [26] PUTNAM R D.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J]. Journal of Democracy, 1995(1):65-78.
- [27] 徐祥临.习近平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顶层设计科学性初探[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4):19-26.
- [28] 杨艳文.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绘就美丽中国底色——中国农民合作社与农业绿色发展[J].中国农民合作社,2020(3):28-30.
- [29] 李俏,金星.资本下乡与环境危机:农民应对行为策略及其困境——基于湖南汨罗市S村的实地调查[J].现代经济探讨,2018(2):108-115.
- [30] 宋紫峰.全球产业分工格局:未来走势及中国位势[J].国家治理,2018(23):26-33.